

## 揭发批判“四人帮” 反对农业学大寨的罪行

市农业局党委书记 董家邦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一伙典型的戴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为了篡党夺权，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现在我代表郊区系统到会同志，揭发批判“四人帮”以及马、徐、王疯狂反对和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罪行。

### 第一，他们对抗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 的伟大号召，另树一帜。

大寨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手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王张江姚“四人帮”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和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拚命反对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指示。一九六八年以来，张春桥就多次说什么：“自己搞嘛，为什么要去学人家的？！”他还狂妄地叫嚷郊区要“争气”，“要为全国和全世界作出样子”，“成为全国农业的样板，良种的基地，农业机械化的典型”，国营农场也要“闯出一条路子”，妄图把“农业学大寨”变为“农业学上海”，为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

对郊区广大群众、干部学大寨的积极性，他们横加指责，百般压制。一九六八年，市农业局有个同志参加农林部组织的到大寨参观学习，回来后向市革委会写了一个报告，建议组织郊区干部去大寨参观学习。王少庸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大发雷霆，说：“他有什么资格给市革委会下命令，干涉起市革委会来了。”并且下了一道“禁令”：不论谁要去大寨参观，都必须经过张春桥批准。他们这个所谓批准，实际上就是一律不准。各县同志都提出过十次、二十次的申请，从来没有一次得到同意。

这里,我们还要指出,他们去年也请陈永贵同志来过上海,今年也派几个人去过大寨。他们为什么请陈永贵同志来上海呢?王洪文就有过自白:“人家都请了,上海不请,人家要骂你骄傲的”;去大寨的因由,王秀珍也有个自供:“这是农林部安排的,还是去吧,不去又要给人家捞稻草了”。陈永贵同志来作了报告,他们根本不组织学习讨论,去大寨的同志回来后,他们还借口“不要冲淡批邓”,不准传达参观的体会,这不充分说明他们请、派的目的,纯粹是装装样子骗人的吗?

“四人帮”及马、徐、王反对学大寨,心怀叵测,另搞一套,这也是他们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的罪恶行径,是他们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的反革命面目的暴露。

## 第二,他们篡改、歪曲大寨根本经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四人帮”及马、徐、王,对大寨的根本经验,全面否定。马天水自己就承认:“我是看不起大寨的。”马、徐、王紧跟“四人帮”,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谁要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就给你扣上一顶“修正主义”的大帽子。谁要努力搞好生产,他们又给你扣上一顶“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弄得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干也不好,不干也不好。其实,这两顶帽子恰恰是戴在他们自己的头上最合适。马天水胡说“大寨就是大干”,“深挖沟,广积肥,园田化,改造低产田,就是学大寨”。他公然把大寨污蔑为单纯的生产典型,阉割大寨根本经验,鼓吹“唯生产力论”。而另一方面,谁要真的大干社会主义,他又竭力反对。张春桥竟然胡说:“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他还对国营农场的同志说:“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真是混蛋透顶。按照他们的逻辑,干革命就只有喝西北风了。

“四人帮”及马、徐、王肆意篡改大寨根本经验的罪恶目的,就是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去年,广大干部、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实际批判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解决方向道路问题。马、徐、王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刻暴跳起来,胡说这是把郊区说成“漆黑一团”,不准向资本主义开展斗争。

他们为什么不准批判资本主义呢?因为根子就在“四人帮”及马、徐、王的身上,只要一深挖,就要把他们挖出来,显出原形。这里,我们举一、二个例子来说一下:

郊区有的地方为什么背离了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教导，钞票挂帅和劳力外流？就是“四人帮”及马天水等人鼓吹出来的。对于这种破坏以农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倾向，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地进行了斗争，而马天水对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泼冷水，胡说什么：“把这个作为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是不妥当的。”

郊区有些社队工业存在着自由发展、自由经营的问题，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纳入计划轨道，为什么就是解决不了？根子也在“四人帮”。朱永嘉秉承张春桥的意图，在《学习与批判》今年第九期上炮制的一篇黑文中，还继续鼓吹自由挂钩、自找门路、自由发展，并且把它说成是“群众路线”，是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郊区集体经营的副业，为什么有的又变成单干了？这个妖风，也是张春桥刮起来的。拿草包生产来说，本来是集体经营，而且是半机械化生产，一九七二年张春桥在一个材料上作了黑批示，提出可以分散生产，结果有些地方的草包生产就单干了。

“四人帮”一贯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者”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捍卫者”，动不动训人骂人，给人家扣上“修正主义”、“复辟倒退”的大帽子。其实，一贯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搞复辟倒退的正是他们自己。

### 第三，他们妄图扼杀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

农业学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昔阳三年建成大寨县，使农业学大寨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去年十月，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党中央发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伟大号召。这是我们党领导亿万农民深入社会主义革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军，对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宏伟规划，具有重大意义，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四人帮”更是恨之入骨，疯狂地进行干扰和破坏。

在会议期间，江青、姚文元就要尽了阴谋诡计，妄图制造分裂，扭转会议方向，遭到了党中央的坚决抵制，阴谋未能得逞。

会议之后，“四人帮”以及马、徐、王又不准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会议精神，胡说“开大会，是大哄大嗡”，“不开会，也可以发动群众”。妄图扑灭群众革命的烈火。

他们特别集中地攻击华国锋同志的报告。马、徐、王亲自出马，或者通过其他人，逐条攻击，全盘否定。

华国锋同志说，“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王少庸就讲：“县委是关键，省委是不是关键！？还有中央呢！？”把矛头直指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华国锋同志提出，县委每年要集中搞一次整风。马天水就攻击“这是静止的搞，是老经验，是形而上学”。

华国锋同志提出要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马天水蓄意掩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尖锐斗争的客观事实，胡说：“现在郊区的形势不是很好吗？好的典型不树，不表扬，还要狠批资本主义，这不是脱离了当前的实际吗？”

华国锋同志说，在基层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省、地、县都要派大批干部下去。马、徐、王就污蔑这是“资反路线”、“桃园经验”，说什么“不派工作队照样增产”。各县按照华国锋同志的指示，派了工作队下去，他们还要追查。徐景贤说：“我不同意派工作队下去，市委幸亏没有派，如果派了就要犯大错误。”

陈永贵同志今年六月在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上，重申了华国锋同志的报告精神，并且指出：派工作队下去“下得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把工作队叫回来“叫得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马天水就攻击陈副总理讲话“不全面”、“上海有上海的情况”。

他们这样恶毒攻击，无非是要给华国锋同志的报告扣上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个是从根本上取消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再一个是为打倒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制造反革命舆论。充分暴露了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第四，他们反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要害，

就是为了篡党夺权。

“四人帮”为什么那么疯狂地攻击华国锋同志呢？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已经把他们的险恶用心暴露无遗。马、徐、王紧跟“四人帮”，胡说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是“出了冷门”。在二月七日县委书记会议上，当讨论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时，冯国柱大讲什么“源”与“流”的关系，说资本主义在下面的是流，源在上面，“当前主要是解决源的问题”。王少庸更猖狂地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冯国柱还说：“我向你们交个底吧：大寨会议文件，我们看了，议了，马老说，主席圈阅的，不等于都同意，现在还要看，让他表演表演嘛！”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他们篡改、歪曲、反对大寨的根本经验，还有一个险恶用心，就是把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谁都知道，大寨的根本经验是周总理亲自总结和明确强调学大寨要学根本的。周总理一贯坚决贯彻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赤胆忠心，光明磊落。“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自然把周总理看作是巨大障碍，从不放过任何机

会进行反对和迫害。

“四人帮”反对华国锋同志、反对周恩来总理，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他们对毛主席关于农业问题的各项指示，也是一贯对抗。毛主席指示要“抓革命，促生产”，“四人帮”就别有用心地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进行干扰和破坏。毛主席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张春桥在一九七一年传达贯彻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精神时，却胡说为什么“你们老是机械化、机械化”，“农业机械化是业务部门的事情，市委不要抓”。

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由小向大过渡的问题上，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指出，需要大集体有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大体趋于平衡。华国锋同志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的报告，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指出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就全国多数地区来说，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基本适应的。同时指出，“随着建设大寨县运动的普及和提高，随着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这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逐步向以大队乃至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过渡。”郊区有些生产大队，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报告精神，进行了“过渡”试点工作，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不仅反对和篡改毛主席和华主席的指示，还借着这个问题，大作文章，要拼凑出一个什么“张春桥”思想体系。

张春桥在今年六月五日的一个黑批示中，否定毛主席和华主席提出的大队要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生产队之间经济大体平衡的过渡条件，胡说：“要抓各种典型，特别是穷队的典型，有全国意义”，“这可能是一个全国性问题”。王洪文也说：“不想搞穷大队过渡，就是不想搞革命，反对农村所有制变革。”马、徐、王紧跟着大叫大嚷：“穷队不够条件也可以过渡”，“领导班子弱的，甚至有疑难杂症的，也可以过渡”。他们这样干有一个更阴险的目的，就是为张春桥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朱永嘉的话就泄露了他们的天机。他说：半年之后要出一本书，要象毛主席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样，写序言，加按语。要“站得高，口气大，有点哲理，居高临下”。甚至狗胆包天地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得晚了，等到出来，高潮已经过去了，这次要抓得早，要写在高潮到来之前。他们这样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大搞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为了要制造出一个所谓超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张春桥思想”。所谓“张春桥思想”，是由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所有制过渡问题三个部分组成的。真是狂妄之极，反动透顶。

× × × ×

市委召开这次党员干部会议，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使我们在斗

争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们决心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上海市委领导下，把这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推向新高潮，抓革命，促生产，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